
葡月的错位

(四) 被误认的社会主义与拒绝联结的抗争者

作者：张皓翔

ORCID: 0009-0001-2997-7726

1851 年 12 月中旬，英国伦敦索霍区迪恩街 28 号房间中，一位正值壮年却已肝病缠身、背部生痛的斗士写下了这样一句话："这样，法国国民的广大群众便是由一些同名数相加形成的，好像一袋马铃薯是由袋中的一个马铃薯所集成的那样。"

而同一个人，同样的时间，同样的地点，他还为黑格尔在某个地方说过的一句话做过一次重要的补充。一切伟大的世界历史事变和人物，可以说都出现过两次——一次作为悲剧出现，第二次作为笑剧出现。

一个半世纪之后，历史确实再次重现了历史，呈现了一场对看客与资产阶级而言的笑剧，但却是对 21 世纪的无产阶级与共产主义事业自身的严肃拷问。2026 年 9 月到 10 月的这场葡月运动，表现出了一种极为扎眼的特征：高度的去中心化、去政党化，极度的警惕政党的组织与联结。

这不是偶然，这是两个时代之间一次意味深长的回声。

马克思当年写下"马铃薯"这个比喻，说的是法国的农民。他们利益一致，处境相同，却像一袋马铃薯里的一个个马铃薯，被装进同一个麻袋，却彼此隔绝，无法联结为一个阶级。那是"不能联结"——历史条件不成熟，生产关系没有把他们拧成一股绳，他们无法自己代表自己，于是把一个冒险家推上了王座。

一个半世纪之后的这场运动，恰恰翻了个个儿。这一代抗争者不是"不能联结"，而是"拒绝联结"。他们拥有比 1851 年的法国农民丰富得多的联结手段，互联网与即时通讯让同一种愤怒在几小时之内席卷整个欧洲。他们也不是没有联结过——他们基于爱好、基于身份认同、基于对同一套压迫的共同感受，迅速地聚拢在一起。可他们偏偏在最关键的一步停了下来，拒绝走向那个唯一能让他们真正成为"自为阶级"的联结。他们拒绝政党，拒绝组织，拒绝纪律，把这一切都当作需要警惕的东西。

这里必须澄清一层，否则就会把这场运动读浅。

有人把这解释成"新一代吃饱了撑的"——物质丰裕了，于是去追求一些虚无缥缈的"尊严"与"意义"。这是资产阶级理论家最愿意听到的说法，因为它把一场严肃的社会矛盾，降格成了青春期的叛逆。事实恰恰相反，这场运动的严肃性，正在于它所反对的东西比饥饿更深。

人首先是一个生物体，他第一要解决的，是生理性的生存，是吃饱饭。在这一点上，这一代人是幸运的，生产力发展，让欧洲劳动者从"吃不饱"迈进了"能吃饱"的状态。那种温饱的满足是实实在在的，谁也不能否认。

但人同时是一个社会体。吃饱了的人，还会继续追问：我是不是只能作为一个零件，被安排、被买卖、被征用？这才是这场运动真正的痛点。他们反对的，已经不是"我吃不饱"，甚至不是"我被剥削了剩余价值"，而是"在资本—雇佣—权力这套关系里，我现实关系的财富被剥夺了——我仍然无法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而存活，只能作为社会机器上的一个零件，被

随意地安排”。

这不是两个矛盾,而是同一个矛盾的两个方面。劳动者与要素化压迫之间的矛盾从未消失,只是它的主要方面,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发生了迁移——从“肚子”迁到了“灵魂”,从“生存”迁到了“存在”。早期,生理性生存是矛盾的主要方面,支配着斗争的方向;如今,主体性的存在成了矛盾的主要方面。所以这场运动的前哨与先锋不再是产业劳动者——产业劳动者仍在为第一个方面而斗争也必须为第一方面而斗争——而是学生、是黄马甲、是那些真切感受到了“现实关系的财富”被剥夺的青年。这也就解释了一个让许多观察者困惑的现象:为什么这一次站出来的,不是工厂里的工人,而是学生。

但要理解他们为什么“拒绝联结”,尤其是为什么对“政党”这个形式怀着如此深的警惕,就必须回到那个被误认了的历史。

20 世纪的冷战,苏联是社会主义的标杆。它废除私有制,宣布自己走上了人的解放的道路,然而它走偏了——它用手段替换了目的,把“计划”这个本该只是手段的东西,当成了自己要到达的彼岸。它去除了私有制,却没有去除要素化。而要素化,恰恰具有和资本一样的扩张本性:资本要把一切都卷入资本逻辑,要素化要把一切都要素化掉。

于是一幕历史的荒诞剧上演了。苏联这个废除了私有制的国家,借着要素化,不断地要素化着欧洲的劳动者。那些劳动者忽然发现,资本主义社会里的劳动者,因为美苏争霸迫使资本让渡了更多的自由,反而过得“更舒服”;而那个号称解放了人的国家,却把越来越多的人,卷入它那要素化的计划里,试图让他们臣服。

这决不能简单地归结为“社会主义的必然”,更不能归结为“历史的定点”。苏联走上社会主义道路,是当时人们的选择,是路径;而在那个历史条件下,要素化无法被彻底去除,这是必然。于是路径与必然撞在了一起:人们选择了社会主义这条路径,却没能在这条路径上扬弃掉要素化这个必然,要素化便借着“计划”这个形态,在新路径里存续了下来。而后人把这一存续,误认成了路径本身的性质——“社会主义只有计划一种形式”。

这才是釜底抽薪的一刀。苏联不是要素化的反面,而是要素化在另一条路径上的延续。它证明的,不是“社会主义错了”,而是一个更残酷的真理:在生产力还没有成熟到足以扬弃要素化的阶段,废除私有制,只能把要素化从“买卖”换成“安排”,却不能消灭它本身。资本主义是“买卖”形态的要素化,苏联是“安排”形态的要素化——两者是同一个压迫的两种面孔,谁也不是谁的解放。

理解了这一层,才能读懂这一代抗争者那种“警惕”的真实含义。

他们警惕的,不是马克思主义,不是共产主义,甚至不是斯大林这个具体的人。他们中的绝大多数,根本不知道“要素化”这个概念。但他们用身体记住了那个被概念所指认的现实——一种“即使去除了资本,我仍然无法作为一个主体的人去存活,仍然被当作一个零件随意安排”的生活方式。

他们警惕的,从来不是某一标签,而是标签的所指。不是组织纪律本身,不是目标本身,而是那个“去除了私有制、却保留了要素化”的状态。他们曾经的生活告诉他们:废除了私有制,人也未必解放;没有了资本家,你依然可以被计划安排得明明白白。

但指出了这个历史条件,绝不等于认同这场运动的去政党化。恰恰相反,这是因噎废食。

劳动者对政党的警惕,有它真实的历史根源,这一点必须承认,也必须理解。但把“警惕可能异化的组织”推到极端,变成“拒绝一切组织”,就是把孩子和洗澡水一起泼掉了。苏联的教训,提醒着我们对要素化这一更深刻的问题的讨论与思考。而不是否定组织本身。没有先锋队,没有组织纪律,没有政党,去对抗一个高度组织化的资产阶级国家机器,无异于以卵击石。

至于“去政党化”是否在某一时刻成为可讨论的议题,那要等到另一个历史阶段,等到完成了第一阶段的革命,革除了资本主义制度,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实现了公有制,但即使如此,

这也只是一个可讨论的议题，而非一定的必然选择。第一种斗争——打破私有制、建立公有制——必须、也只能依靠先锋队、组织纪律和政党来完成，这是不可逾越的前提。没有第一种斗争奠定的公有制基础，任何去要素化、去政党化的幻想，都只能是空中楼阁。这正是这场运动错位的根子所在：它跳过了第一种斗争，直接发起第二种斗争，用一个拒绝组织的姿态，去对抗一个高度组织的对手。

于是我们终于可以回到开头那句关于悲剧与笑剧的话。

1851 年，法国农民因为不能联结，把一个冒险家推上了王座，那是一场悲剧。今天，这一代抗争者因为拒绝联结，把一场本该严肃的斗争，演成了一场对看客与资产阶级而言的笑剧。马铃薯的比喻没有过时，它只是换了主角——当年是“不能联结”，如今是“拒绝联结”。而历史的教训是：无论是不能联结，还是拒绝联结，联结的缺席，最后都只会让那个真正掌握着组织的力量的人，坐收渔利。

火光可以烧穿一间教室的门，却烧不穿资本编织的要素化之网。要烧穿这网，需要的恰恰是这场运动所拒绝的东西——组织，纪律，和一个真正的党。